

1923年的德国

奥尔洛娃著

4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23 年的 德 国

奥 尔 洛 娃 著

虎 溪 译

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

本书比较全面地、扼要地叙述了1923年德国的政治经济情况。1923年1月，法国和比利时借口德国没有及时付出战后赔款，出兵占领了德国重工业区鲁尔，美英两国不加干涉，采取纵容法国的观望态度。德国资产阶级不抵抗，只顾发国难财，他们的投机活动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国库日空，工人失业者日多，生活极端困难。德国共产党领导着人民为抵抗侵略者和为改善工人生活而斗争。但当时党还不够成熟，党内无坚强的领导，故在革命形势形成时，错过了领导人民夺取政权的机会，反而命令人民退却。9至10月悲剧之后，反革命势力占了上风。作者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科学地分析了这一年的史实，总结了经验教训。本书可作为高等学校历史系师生，德国史、世界现代史、共产主义运动史研究者参考之用。

1923年的德国

M. H. 奥尔洛娃著

虎溪译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北京宣武门内承恩寺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出字第054号)

京华印书局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1010·56 开本727×1092¹/₃₂ 印张3¹¹/₁₆

字数85,000 印数0001—2,600 定价(2)¥0.30

1959年6月第1版 1959年6月第1次印刷

目 录

“魯尔危机”和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

魯尔冲突。德国的国际环境	1
消极抵抗	7
1923 年上半年德国的經濟情况	11
德共的政策和策略	17
德国統一战綫的建立	33
对消极抵抗的“背后打击”	41
两条战綫上群众斗争的开始	46

革命危机。无产阶级的失败

资本主义經濟的破坏和瓦解	53
8 月罢工。推翻古諾政府	60
行动中的“大联合”。斯脫萊斯曼第一屆內閣的危机和辞职	67
9至10 月的悲剧	77
反革命势力的胜利	103
譯者后記	

“魯尔危机”和德国革命形势的成熟

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以后的头几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都发生了深刻的政治危机。在許多国家、首先在德国，形势特别紧张——是一种革命的形势。1918年11月里德国爆发革命的时候，大战尚未宣告結束。随之而来的是：1919年1月的战斗、巴伐利亚苏維埃共和国、1919年春夏两季的革命高涨、群众的政治积极性由于卡普叛乱而大为提高，嗣后，是1920年的苏波战争（曾激起群众性的抗議，反对再一次武装干涉苏联），1921年德国中部的战斗，最后，是1923年的革命危机。德国人民又处在革命前夕了。

魯尔冲突。德国的国际环境

帝国主义之間、特别是法德两国之間的矛盾，在1923年已形成为所謂的魯尔冲突；这种矛盾的日益增加，对于德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日趋紧张，有着决定意义。法比两国的军队借口德国沒有支付已规定的賠款，占领了德国工业的心脏——萊因—魯尔工业区。

普恩卡尔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是根据下面两点决定的：法帝国主义力求在西欧大陆上确立自己的經濟和政治霸权；害怕已战敗的德国将来进行报复。

英国外交的两面派策略和美国統治集团的利己政策，对普恩卡尔的冒险行为，起了不小的促进作用。

外表上,英国政府装作冷淡旁观的模样,甚至要法国政府确信它是忠诚的,在法德两国冲突的初期更是如此^①。可是,这样作并不影响英国政府在外交上暗地里促使法国遭到失败。寇松及其集团竭力煽起法德两国的冲突,希望它们互相削弱,这样,英国就可能在欧洲政治舞台上取得霸权。

欧洲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的帝国主义集团也就酝酿好了长远的计划。美国的外交在巴黎和会上遭到失败,主要是由于英法反对美国统治世界的计划的结果。当这两个欧洲国家采取一些一致的行动时,美国出来干涉欧洲事务,是没有取得胜利的指望的。

但是,在1922年末至1923年初期,英法的团结却发生了严重的裂痕。美国便力求加深这一裂痕,以便在欧洲引起危机,从而以“公正”仲裁者的身份来进行干涉。后来,美国拟定“赔款计划”的道威斯将军很有理由这样说:“法国不来到鲁尔,我们也就不会到这里来”(指欧洲)^②。美国没有答复德国关于指责法国侵略行为的照会,反而采取了令人怀疑的观望态

① “德国人民党”的首领 F. 斯脱莱斯曼在1923年1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内阁毫无动静,很刻薄。对法国人毫无妨碍……”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Der Nachlass in drei Bänden (“遗著三卷集”——译者). B., 1932—1933, B. I, S. 32 (以下称: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社会民主党的政论家克维塞耳写道:“在能看透事物本质的人看来,鲁尔战争是贴有‘英国制’的商标的”(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 1923, №7, S. 399. 以下称: S. M. №……)。

② R. Dawes. The Dawes Plan in the making... With foreword by F. O. Lowden (“道威斯计划制订过程”, 有罗顿写的“前言”——译者).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Co. 1925, P. 185.

度，法德两国的冲突日益展开和加剧，美国并未加以阻止。同时，摩根曾通过自己的巴黎分行——同法国重工业銀行“АТЮ-нион Паризьск”有着密切关系的“П. 摩根”，洛克菲勒曾通过“Банк де Пари ө де Пан-ба”（巴黎荷兰銀行——譯者）和“法美公司”，来协助法国的帝国主义集团为侵略德国作好准备^①。

以斯丁納为首的德国工业大王曾促使德国走上同法国发生冲突的道路。在И. 維尔特的“执行政府”^②于1922年11月辞职之后，古諾—罗眞別格^③的“事务內閣”上台执政就意味着：1920年斯丁納在斯貝會議上所宣布的“灾难政策”已經取得胜利。消极地向協約国支付賠款，就是这一政策的基础。

① K. Obermann. Die Beziehungen des amerikanischen Imperialismus zum deutschen Imperialismus in der Zeit der Weimarer Republik (“魏瑪共和国时期美帝国主义与德帝国主义的关系”——譯者) (1918—1925). B., 1952, S. 119.

② “执行政府”的目的在于：使德国根据凡尔賽条約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化为烏有，并通过創造有利于德帝国主义的条件来准备复仇。——譯者

③ 就政治傾向來說，古諾属于“德國人民党”和中派；卡普叛乱之前，他就参加了“德國人民党”。在經濟上，古諾接近克虜伯—維登菲耳德集团，而这个集团同美国資本、特別同哈里曼和洛克菲勒又有联系。古諾是“德美石油公司”（“美孚石油公司”的德国分支）管制委员会的委員和德美輪船公司的經理。这些关系，也成了古諾在对外政策的方針上亲美的基础。古諾在作政府首脑后不久的一次发言中曾声称：“他将使自己和美国在事务上的良好关系，为德意志国家服务”（Die Internationale. 1922, № 12, S. 355）。古諾同意解决和法国的冲突时，指望得到美国的支援（S. M., 1923, № 6, S. 334）。古諾政府的外交部长罗眞別格是德皇的外交官，参加拟訂过布勒斯特和約，他属于“德國人民党”的极右翼。担任經濟部长职位的，是斯丁納的走狗別克。古諾政府一上台执政，大资产阶级便公开执掌德国的政柄了。

法国占领鲁尔的威胁，并没有使斯丁纳感到一点惊慌。斯丁纳有理由作这样的指望：法国占领西欧的工业中心，必然会使英法的关系紧张起来，复活德帝国主义的计划便能得到英美统治集团更有效的支持。

法德两国的工业家卢什尔和斯丁纳关于成立鲁尔—洛林煤炭钢铁联合辛迪加的谈判破裂以后，才发生公开的冲突。法国的垄断组织企图得到预计的辛迪加 60% 的股票，鲁尔的大资本家却只同意给与 50%。“和平”交易没有成功。嗣后，双方都一心指望通过武力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并且为采取行动制造借口。

工人阶级的一致行动，是可以防止伦敦和纽约所煽动的法德垄断组织的争吵的。1923 年 1 月 6 至 7 日在埃森举行的国际工人代表会议，就是一个尝试。这次会议，是为了反对法国占领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威胁而召开的。会议曾号召工人共同行动，阻止法国占领鲁尔。但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却被第二国际和第二半国际的分裂分子破坏了。

德共对鲁尔被占领一事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 1922 年，当法德关系显然紧张了的时候，德共就曾建议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在反对法德侵袭威胁的斗争中，采取一致的行动。可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却拒绝了这个建议。不过，尽管社会民主党的首脑采取了这种立场，德国的工人阶级仍然一致表示决心，要防止侵略。1 月 7、8 两日，格森基亨、杜伊斯堡、汉波伦、埃森等许多城市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以表示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德共曾再一次呼吁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

国工会联合总会建立工人的統一战綫。德共的建議^①中指出，在魯尔占領的問題上，古諾的罪过并不亚于普恩卡尔；建議中还提出在德国举行总罢工，以便回击法国侵略势力的阴谋，并把賠款的負担加到有产阶级的肩上，以工人政府代替古諾政府等等。但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的领导者又拒絕了德共的建議，反而同资产阶级勾結在一起。这样，必然会削弱德国人民的反抗力量，便于法德两国的統治集团挑起魯尔冲突。

可見，魯尔危机乃是法、英、美三国侵略势力施行帝国主义阴谋的結果，乃是以斯丁納“人民党”为首的德国资产阶级采取挑撥行为的結果，——上述情况，是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的首領拒絕同共产党合作因而使工人阶级陷于分裂的情况下发生的。

魯尔冲突迫使欧洲面临着新的国际大屠杀的威胁。外国奴役的危險临到了德国头上。当法比军队强占魯尔的时候，德国东面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只等待他們出动的信号。波兰外交部长斯克爾任斯基曾声称：“假若法国要我們共同行动，毫无疑问，我們会表示同意的。”^②“真理报”当时写道：“波兰出动的危險是存在着。”然后，“捷克斯洛伐克也会掙脫鎖鏈的。”^③德国受到敌对同盟的夹攻，在资本主义国家結成的陣綫面前，它是孤立无援的。希望落空了，古諾痛苦地說道：“在全世界，我們都是孤零零的。”^④

① Rote Fahne(“紅旗”——譯者)，1923年1月11日。

② “真理报”，1923年1月24日。

③ 同上，1923年1月19日。

④ G. Stresemann. Vermächtnis, B. I, S. 41.

在这危急的时刻，德国人民得到了国际无产阶级、首先是它先进的先锋队——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强有力的支援。1、3月里，欧洲国家共产党在埃森和美因河上的法兰克福召开了两次代表会议，号召工人共同斗争反对国际资本家的帝国主义冒险行为。欧洲国家的共产党根据无产阶级革命团结的原则，一致决心要全力支持战斗的德国无产阶级。

在所有的国家中，只有苏维埃共和国断然发出了愤怒的呼声，抗议法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1923年1月2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了告各国人民书^①，苏联政府揭露了鲁尔危机的实质及其祸首。苏联政府把欧洲面临的流血威胁预告给各国人民，并号召他们积极争取和平。苏联全国都举行了抗议法国侵略者、保卫德国的群众性示威。苏联人民最热烈、最真诚地参加了鲁尔无产阶级的斗争，给他们以巨大的物质援助。1923年3月，苏联全国总工会曾送给德国10万金卢布和50万普特粮食。

同时，为了制止法德冲突蔓延，使它不致于扩大到全欧，苏联外交方面还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为了同一目的，人民外交委员会的代表曾访问邻国的首都——华沙、里加、列维尔和科甫诺。苏联政府坚决建议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保持中立，并警告说，苏联决不容许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②。最后，德国东面的邻国尽管未曾同意签订正式的中立协定，但是，它们也不敢参加法国的冒险行动。

① “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莫斯科，第2卷，1944年，第707页。

② “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向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1923年年度报告”，莫斯科，1924年，第42至43页。

在魯尔危机的初期，德国的国际环境就是如此。

消极抵抗

古諾政府宣布，对魯尔的被占领实行消极抵抗。德国从巴黎和布魯塞尔召回了外交代表。对法比两国停止了煤炭和焦炭的供应。魯尔区的德国企业，凡是它們的产品可能为占领国所利用的，則必須停工。魯尔的官吏、铁路工人及全体居民都得到命令說，不許执行占领当局的命令。“魯尔战争”开始了。

在这次“战争”中，德国壟断資本家当然是最不考慮德国的民族利益了。他們追求着特殊的目的：以組織消极抵抗、把資本家和国家的利益混为一談的方式，来动员全德国的人民，保护資本家的利潤。在敌人面前表現的“民族团結”，必須成为一个压制法国資本家的工具，以便从他們手里，取得比1922年12月卢什尔提出的更为有利的交易条件。同时，由于政府撥款援助，消极抵抗便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财致富和投机倒把的机会。

可是，这些自私的打算，都用肆无忌惮的“民族的”和“爱国的”煽动宣傳掩盖起来了。德国資產階級提出了“祖国在危險中！”的口号。占领魯尔曾比之于拿破侖对俄国的侵略^①。1月14日，宣布为“举国哀悼日”。根据政府的命令，1月15日魯尔举行了半小时的抗議罢工。全国都卷到民族主义的集会和示威的浪潮里来了。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报刊，壟断組織的

^① 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 (“德意志总汇报”——譯者)，1923年1月18日(以下称：D. A. Z.)。

文人，都声嘶力竭地号叫着：必須忘記階級仇恨，而建立統一的民族陣綫，使“共和国与祖国”不至于受到“世仇”的侵襲。

和凡尔賽的耻辱一样，魯尔被占領一事也造成了法西斯运动及其“民族的”、“社会主义的”煽动宣傳猛烈高漲的局面。“魏瑪民主共和国”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领导机构所推行的政策，使群众日益感到失望，反对卡特尔和資本主义的情緒在不断增长；德国极端反动的帝国主义势力力图利用上述情况，来破坏資产階級民主制，而用武力建立起財政資本絕對的专政。

法西斯的宣傳首先是要爭取中間阶层，因为它們是民族社会运动主要的群众支柱。就社会地位來說，正是这些居民阶层在政治上的愛憎最不堅定，这决不是偶然的。法西斯的鼓动分子到处許愿，根本不考慮还愿的問題，他們仅追求一个目的：尽量地收罗支持他們的人們。他們曾答应实行“托拉斯国家化”、“銀行国有化”、“取消股票資本”，保証“工人参与生产管理和利潤分配”，实行土地改革，“改善中間阶层的状况”，等等^①。法西斯分子拼命装成从“凡尔賽桎梏”下爭取德国民

^① 参阅：Chronik des Faschismus (“法西斯紀事”——譯者)，1924，№ 2，S. 22—23；以及下列論文：V. M. Walter. Die Landwirtschaft und der Faschismus (“法西斯与农业”——譯者) (同上，№ 4)；Das Programm der völkischen Kampforganisationen (“人民战斗职工会綱領”——譯者) (同上，S. 23—24)；G. L. Alexander. Die Frauen und die Stahlhelm (“妇女与鋼盔团”——譯者) (同上)；K. 格依登：“德国法西斯主义的历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35 年。在我們研究的这一时期，德国的法西斯运动尚未集中起来。在国内北部活动的是“德国工会”，在南部活动的，是希特勒的“社会民族工人党”。此外，还建立了許多更为細小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集团(号称为“Фёлькише”——譯者)以及法西斯的恐怖組織，它們具有分支很广泛的代理机关在萊茵区和魯尔更是如此。这些組織同国防軍的联系很密切，并且常常得到政府的補助。

族解放的“战士”，貼出一幅自己是民族思想的唯一代表这种动人听聞的广告。一部分在危机中遭到破产的小資產階級参加了法西斯运动，他們希望去掉凡尔賽的鎖鏈与危机的痛苦，摆脱破产与无产階級化的命运。

社会民主党的报刊及其首領曾按照 1914 年 8 月 4 日的先例，和資產階級結成統一戰綫，同資產階級的宣傳唱着一个調子。該党的領導者承認过古諾政府“……并未体现德国意志不可分割的統一性”^①，同时又公开放弃爭取社会主义原則的斗争^②；他們仅仅爭取“参与管理”，建立“大联合”——資產階級的社会主义政府。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上层官僚不顧資產階級上层統治者忽視这些要求的事实，仍然提倡資產階級所宣布的“人民統一戰綫”。他們借口說，在敌人面前“分散力量”是危險的，而要求放弃两条戰綫上——反对德法两个帝国主义——的斗争。

1923 年 1 月里，德国工会联合总会、職員联合会和官吏联合会都曾表示支持政府。总罢工可能削弱政权的地位^③，因此，1 月 23 日在柏林通过了放弃总罢工的決議。同时，工会的領導者和企业老板一道，組織了一系列具有民族主义性質的罢工^④。

① S. M., 1923, № 1, S. 2. Г. К. 哲維林格：“时机的要求”。

② Ф. 梅耶尔曾写道：“以后，社会民主党的实际政策不見得必須和社会化的要求有关。在目前，社会化的問題并没有实际的政治意义”(S. M., 1923, № 3, S. 150)。

③ “国际工人运动”，1923 年，第 2 期，第 2 頁。

④ 同上，第 3 期，第 3 至 4 頁。

在社会民主党和改良主义工会积极的配合下，资产阶级的宣傳曾一度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旗帜下，把德国广大的群众，誘騙到帝国主义的魯尔冲突中来。甚至有很大一部分工人，在謊言和“民族的”煽动宣傳下，也曾站在同本国资产阶级保持“阶级和平”的立場上，反对过法国侵略者。由于法国军队迫害以梯森为首的六个大工业家而引起的罢工，最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根据“Vorwärts”(“前进报”，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的报导^①，15座大矿山在1月23日举行了罢工。为了表示抗議，梯森的企业里有65,000名工人于1月23日宣布了罢工^②。“埃森矿业公司”和格森基亨的矿山、斯丁納的“維克托里”等許多企业，都举行了罢工^③。国家矿山联合工厂委员会决定成立被捕矿山主的“援救委员会”，并派遣該委员会去見法国占領軍的司令德古特將軍^④。“Фр. 梯森”矿山和“A. 梯森”冶金工厂組成的工厂委员会代表团見到德古特以后，曾代表3万工人要求釋放他們的“供养人”——梯森^⑤。1月21日，魯尔10万工人的抗議书交給了德古特^⑥。

① “Vorwärts”，1923年1月23日。

② H. Spethmann. Zwölf Jahre Ruhrbergbau (“魯尔矿业十二年”——譯者)，B.，1928—1931，B. IV，S. 105 (以下称：H. Spethmann; 上引著作……)。

③ 技术人員和職員离开了企业，可見，工人們在許多場合下是被迫举行罢工的。例如，斯丁納矿山的情况就是如此(Rote Fahne, 1923年1月21日)。还查明了这样的情况：来到美國救打救梯森及其企业經理的代表团并沒有一点工人授与的权限，他們是行政当局派去的(“国际工人运动”，1923年，第3期，第4頁)。

④ “Vorwärts”，1923年1月20日。

⑤ Frankfurter Zeitung (“法兰克福新聞”——譯者)，1923年1月21日。

⑥ D. A. Z.，1923年1月23日。

根据改良主义者的倡議，抗議代表团也曾派往美因茲，当时，法国的軍事法庭正在这里审理被捕的企业主（資產階級报刊把他們吹嘘为“民族英雄”）的案件。

为了从經濟上支援消极抵抗，为了援助政府，德国社会民主党、德国工会联合总会、德国工业帝国联合会、德国雇主工会联合会以及“民族團結”的其他組織，便成立了“援助魯尔”（Ruhrhilfe）委员会。

“援助魯尔”的基金，是由社会上各个階級筹划的，用来支付罢工企业的职工的工資，赔偿这种企业的老板的损失。同时，“援助魯尔”委员会是“堡夫里登”——改良主义者所吹嘘的劳資合作——的形式之一。

魯尔巨头的“爱国主义”，也得到了政府慷慨的报酬。德国国立銀行給了企业主总数达几十亿馬克的大宗貸款。由此看来，在魯尔冲突的初期，德国資產階級就在自己的“社会主义”走狗的配合下，把大部分人民，都暂时地引誘去追随帝国主义政策了。

1923 年上半年德国的經濟情况

不过，“民族團結”的政策取得上述成就的基础，是极不穩固的，暫時的。从占領魯尔的最初起，國內的經濟生活就不断遭到破坏；这就成为以后产生尖銳的階級斗争的最基本的原因。

1923 年經濟遭到破坏，在主客觀方面，都有重要的前提。当法国的占領使德国失去煤炭总产量的 80%^①、生鉄 76% 以

^① 烏布利希：“德国的战后危机与 1923 年的事件”，“历史問題”，1954 年，第 5 期，第 62 頁（以下称：烏布利希：上引著作……）。

上、鋼鉄 82%^① 以上的时候，当德国分裂为两部分——占领区和非占领区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首先是通货膨胀，还没有消除。工业发达的莱茵—鲁尔区，和德国其余的部分隔开了。国内各地区几十年来形成的经济联系，已遭到破坏。煤、铁等重要商品，几乎不运往德国的非占领区。在国内的两个区域里，外汇牌价和商品价格各不相同。占领军在德国西部的统治和消极抵抗所引起的后果是，生产急剧地下降。工厂和矿山先后宣告停工。1923年生铁的熔铸量，比1913年几乎减少了3/5，比1922年减少了1/2以上；煤的开采量，比1913年下降了1/2以上，比1922年下降了1/2；钢的产量，比1922年的水平几乎降低了1/2^②。以1913年德国工业产量的指数作为100，1923年则只等于46.9%^③。

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卖国政策，经济日益崩溃了。壟断資本家公开宣布：“今天誰只想到私利，誰就該枪毙”（梯森語），他們煽动民族主义的宣傳，拼命地利用非常有利的形势，以便大发横財，并巩固自己在国内的陣地。

为了从財政上支援消极抵抗，政府曾給予魯尔的大王們数十亿貸款：賠償他們由于占领而遭到的損失，并付錢給停工的企业，发給失业補助費，还向罢工工厂的职工发“工資”。根据官方的統計，4月底以前已发出两万多亿紙馬克^④。这笔巨

① Wirtschaft und Statistik (“经济与統計”——譯者)，1923，№ 2，S. 39（以下称：W. und St.）。

② M. И. 奥尔洛娃：“1924至1929年的德国”，莫斯科，1955年，第3頁。

③ Ф. И. 布列格里：“資本主义国家的貨幣流通与信贷”，莫斯科，1952年，第245頁（以下称：Ф. И. 布列格里：上引著作……）。

④ E. 瓦尔加：“1923年的世界經濟和經濟政策”，莫斯科，出版年月不詳，第89頁（以下称：E. 瓦尔加：上引著作……）。

款是在完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发给企业家的。常有这样的事
情：从“援助鲁尔”和“信贷援助”得到的、用来支付工资的贷
款，却被壟断资本家用到通货方面搞鬼去了^①。斯丁纳家族、
梯森家族、克虏伯家族、沃尔夫家族这些巨大的集团，都抓住
国家预算，他们一再要求新的贷款。结果，德国国立银行的黄
金储备消耗很快^②，国家预算的赤字大得惊人。在1923年上
半年，国家大约平均能负担25%的开支，在6月中旬，能负担
10%的开支，在6月底，则只能负担2%的开支了^③。

财政日益遭到破坏，也是工业大王们无耻地拖税的结果；
大家知道，税收是预算极其重要的来源。

1923年的头4个月，有产阶级在所得税总额中所占的比
重不到5%，而对工资的课税则超过了80%^④。为了负担国
家日益增大的开支，政府只好不断地使用印刷机。结果，通货
膨胀日益增长。

2月里，政府曾企图稳定马克。首先为了维持抵抗着的
“统一战线”，这样作是必要的；通货膨胀引起经济混乱，“统
一战綫”就可能遭到破坏。政府的企图，曾取得某些暂时的、相
对的成績。1923年春季里（大约从2月7日至4月7日），马

① Berliner Tageblatt, 1923年4月25日；沃尔夫的3家公司曾使用
作为工资的4亿马克的贷款，来进行投机活动(Rote Fahne, 1923年4月28
日)。

② 在消极抵抗时期，德国国立银行的黄金储备减少了1/2以上。

③ E. 瓦尔加：上引著作，第110页。

④ E. 瓦尔加：上引著作，第40至41页；1923年3月里，所得税方面有
95%的进款，是通过扣扣工资而得来的(F. F. 恩德里顿和K. E. 马克-格瓦尔：
“德国的支付能力”，莫斯科，1924年，第227页)。